

北欧安全秩序何以持续重构？

——基于外部压力、共享身份与话语实践的分析*

彭 博 李 形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北欧次区域安全秩序并未因美苏争霸、欧洲化冲击和北约扩张而消解，反而在持续变化的国际安全环境中被不断重构。既有研究分别从权力结构、地区身份或安全话语等视角解释北欧安全合作，却难以揭示北欧安全秩序持续演化的内在机制。本文以二战后北欧安全秩序的历史演进为研究对象，借鉴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路径，构建一个基于外部压力、共享身份、话语实践的综合性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外部压力是驱动北欧安全秩序变迁的外生变量，共享身份是延续北欧国家合作和维系地区秩序内核的内生变量，二者经由话语实践的建构和再生产，最终转化为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在这一机制作用下，北欧安全秩序先后经历了从冷战时期的“北欧平衡”到后冷战初期地区合作的初步制度化、从克里米亚危机后“北欧团结”的兴起到俄乌冲突和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次区域安全一体化持续深化等历史阶段。北欧次区域安全秩序的持续重构不仅取决于外部安全环境变化，更取决于次区域内部共享身份的韧性和情境性调适，以及相应的话语与政策实践过程。

关键词：北欧安全秩序 外部压力 共享身份 话语实践

一 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北欧五国（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作为一个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批准号：DF2023YS42）的阶段性成果。

独特的次区域,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占据着特殊位置。与冷战时期欧洲大陆深陷东西方两极对峙、铁幕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的格局不同,北欧地区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安全格局。丹麦、挪威、冰岛于194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瑞典坚持其延续逾两百年的武装中立传统,芬兰则因1948年与苏联签署《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而采取被外界冠以“芬兰化”之名的特殊外交政策,五国由此共同维持着一种被学者称为“北欧平衡”(Nordic Balance)的微妙稳定结构。挪威国际关系学者阿尔内·奥拉夫·布伦特兰(Arne Olav Brundtland)于1966年较早系统阐述了这一概念,认为北欧地区的稳定源于大国介入程度的降低。美国与苏联拥有对等的能力,可制衡和约束彼此介入地区事务的潜在动向,进而消除各方主动采取行动加剧北欧局势紧张的动机。在“北欧平衡”格局之下,北欧各小国拥有共同目标,即确保美苏双方不会摒弃或放宽对彼此的约束限制。^①与“北欧平衡”相伴的另一重要叙事是“北欧和平”(Nordic Peace),即北欧五国之间自19世纪初以来从未发生过战争,这一历史现象被建构为基于共同的民主、福利与法治传统的安全共同体典范。^②

伴随冷战的结束,北欧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欧洲化的新阶段。^③丹麦早在1973年就已成为欧共体成员;瑞典、芬兰于1995年加入欧盟;挪威虽然两次公投否决入盟,但通过《欧洲经济区协议》深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这一阶段,北欧国家纷纷将本国安全战略锚定在欧洲一体化框架内,“北欧”作为独立地缘政治单元的色彩有所淡化。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奥利·维夫(Ole Wæver)以“北欧怀旧”(Nordic Nostalgia)为题,描述北欧地区主义在大欧洲叙事中走向衰落的境

① Arne Olav Brundtland, "The Nordic Balance: Past and Presen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1, No.2, 1966, pp.30-63.

② Clive Archer and Pertti Joenniemi, eds., *The Nordic Peace*, Ashgate, 2003; Håkan Wiberg, "The Nordic Security Community: Past, Present, Future," *Danish Foreign Policy Yearbook*, 1 January 2000, pp.121-137.

③ Lene Hansen and Ole Wæv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allenge of the Nordic States*, Routledge, 2002.

况。^①“欧洲化”给北欧地区带来了显著的认同危机。一方面,北欧国家试图在欧盟框架内继续保留其独特的“规范倡导者”(Norm Entrepreneurs)^②形象与人道主义外交传统;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对北欧国家主权的渗透,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原有的北欧合作议程,使得“北欧性”(Nordicness)面临被“欧洲性”(Europeanness)吸纳和冲击的风险。^③

21 世纪以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重新激活了北欧安全合作的内生动力。2008 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和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使北欧国家深刻意识到俄罗斯威胁的回归。2009 年,北欧防务合作组织(NORDEFCO)的成立标志着北欧防务合作进入实质化阶段。^④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引发北欧安全格局的剧烈震荡。长期奉行军事中立的瑞典与坚持军事不结盟的芬兰先后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从而宣告了延续了七十余年的“北欧平衡”格局的终结。2025 年年初,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第二次入主白宫后,便公开宣称美国“必须拥有”隶属于丹麦的格陵兰岛,并表示不排除使用经济胁迫和军事手段实现该目标,使得北欧五国的安全焦虑从对俄罗斯的威胁感知扩展到对美国传统盟友的不信任,进而推动了这些国家在强化“北欧团结”方面的努力。

基于上述近 80 年北欧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本文尝试探讨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即北欧安全秩序为何得以持续重构?该研究问题又可拆解为两个层次:一是北欧国家为什么能够长期维持合作;二是北欧安全秩序为何会发生阶段性转型。

二 既有研究回顾

既有国际安全理论对战后北欧安全合作的解释,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条相互区

① Ole Wæver, “Nordic Nostalgia: Norther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8, No.1, 1992, pp.77-102.

② Christine Ingebritsen, “Norm Entrepreneurs: Scandinavia’s Role in World Politic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7, No.1, 2002, pp.11-23.

③ Christopher S. Browning, “Branding Nordicity: Models, Identity and the Decline of Exceptionalis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2, No.1, 2007, pp.27-51.

④ Tuomas Forsberg, “The Rise of Nordic Defence Cooperation: A Return to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5, 2013, pp.1161-1181.

别又彼此关联的研究路径,即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维夫为代表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的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以及以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埃马努埃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为代表的安全共同体理论(Security Community)。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从物质性结构、话语实践和身份塑造等维度对北欧安全秩序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研究分析。

(一)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北欧安全秩序的结构约束

布赞在《人民、国家与恐惧》中首次提出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概念,其中对敌友模式和权力分布两个变量的设置,奠定了该理论后续发展的核心基础。在《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中,布赞和维夫将地区安全复合体定义为“一组单位,其主要的安全化、去安全化或两者过程是如此紧密地相互关联,以致它们的安全问题不能被合理地相互分离开来进行分析或解决”。^①这一概念强调地理邻近性所造成的安全相互依赖,认为大多数威胁都易于在短距离内传播,因此,安全互动主要在地区层面而非全球层面发生。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出发,北欧地区可以被视为欧洲大陆安全复合体的一个次区域(sub-region),其安全互动深受北欧国家、苏联(俄罗斯)、北约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相互关系的形塑。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将安全研究的分析层次从宏观全球和微观国家的二元结构转向了地区中观层次,为理解北欧次区域安全互动提供了概念工具;其次,它为冷战时期的“北欧平衡”提供了结构性解释,即北欧地区内部之所以能够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是因为它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势力的边缘,从而获得了一定的“地缘政治回旋余地”;最后,它有助于解释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北欧国家集体安全感知的强化,具体表现为俄罗斯对邻国的“军事干预”直接改变了北欧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敌友”模式(amity/enmity)。

然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也存在显著不足。第一,尽管该理论蕴含以安全化机制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要素,但其结构一极性变量更加偏重于物质要素的作

^①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7.

用,过于强调结构性的权力分布,对地区合作中的内生规范动力着墨不足。^① 在解释北欧安全合作时,它难以回答为什么相同的外部压力在不同时期会带来不同的合作形态。例如,1949年面对苏联威胁,丹麦、挪威和冰岛加入北约,而瑞典和芬兰保持中立,且后者采取了日后被概念化为“芬兰化”的政策;而到了2022年,面对俄罗斯威胁,瑞典和芬兰却最终加入了北约。第二,该理论将“区域”的边界视为相对客观和稳定的,难以充分解释北欧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北欧”这一“地理—政治”单元的不同认知和建构方式。第三,该理论对次区域内部合作动力的内生机制缺乏精细分析,难以解释北欧国家何以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实现在非军事领域的功能性合作。

(二)安全化理论:北欧威胁来源的话语实践

安全化理论由哥本哈根学派的维夫、布赞与雅普·德·维尔德(Jaap de Wilde)等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形成,其核心命题是,安全并非客观存在的状态,而是行为体(通常是政治精英)通过言语行为将某一议题建构为存在性威胁,并据此采取超常规措施的过程。^② 维夫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一文中指出,“国家代表通过说出‘安全’一词,将某一特定发展进程移入一个特定领域,从而宣称自己拥有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阻止该进程的特权。”^③ 这一理论将话语实践置于安全研究的核心位置,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在安全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安全化理论对北欧安全合作的解释具有重要价值,它提供了一个理解北欧国家如何通过话语将俄罗斯威胁、移民问题、能源依赖等议题建构为安全议题的分析工具。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S. Browning)与裴尔蒂·约恩涅米(Perti Joenniemi)认为,将软安全议题安全化被视为对国家间关系去安全化的方

^① Stefano Guzzini, “Securitization as a Causal Mechanism,” *Security Dialogue*, Vol.42, No.4-5, 2011, pp.329-341.

^②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5.

^③ Ole Wæ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5.

式,这为打破常规地域限制、推动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的合作提供理由。换言之,软安全议题的安全化有助于克服区域内的“他者性”,以塑造“我们同舟共济”的理念,进而通过包容实现合作。^①此外,安全化理论有助于理解北欧国家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的“再安全化”(re-securitization)转向。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活动被北欧政府重新建构为“存在性威胁”,从而为加强防务投入、深化北约合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尽管如此,安全化理论同样存在三点不足。其一,该理论将话语行为视为安全建构的主要机制,对外部结构性物质压力的作用有所忽视,存在“过度建构主义”(over-constructivist)的倾向。^②其二,安全化理论对长时段、跨议题的合作演化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它将安全动态区隔化,可能掩盖一种更广泛的话语连续性,即在移民、环境变化和传统军事实践等看似迥异的议题背后,存在跨越特定历史与社会背景的共同话语逻辑。^③其三,安全化理论对安全化行为体(securitizing actor)和受众(audience)的关系缺乏精细的层次区分,过度简化了多个且具有不同特征的受众这一基本事实,导致其难以充分解释多边合作场域中复杂的话语互动。^④

(三)安全共同体理论:“北欧和平”的内生动力

多伊奇等人在1957年将安全共同体界定为一个成员国之间不再预期以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对和平变革形成可靠预期的群体,安全共同体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或权力平衡基础上,而是依赖于社会成员间的相互认同、沟通与交易。^⑤冷战结

① Christopher S. Browning and Pertti Joenniemi, “Regionality Beyond Security? The Baltic Sea Region After Enlargemen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9, No.3, 2004, pp.233-253.

② Olav F. Knudsen, “Post-Copenhagen Security Studies: Desecuritizing Securitiza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32, No.3, 2001, pp.355-368.

③ Matt McDonald, “Securit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4, No.4, 2008, pp.563-587.

④ Sarah Léonard and Christian Kaunert, “Reconceptualizing the Audience in Securitization Theory,” in Thierry Balzacq, ed., *Securitization Theory: How Security Problems Emerge and Dissolve*, Routledge, 2011, pp.57-76.

⑤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束后,阿德勒与巴尼特引入建构主义视角,根据国家间的信任水平、制度化程度和共享身份,将安全共同体的演进划分为初生、上升和成熟三个阶段。^① 在北欧语境下,多伊奇将北欧视为以价值相容、相互回应能力、行为可预测性为基础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维夫则以“非战共同体”(non-war community)概念,解释了北欧五国虽在冷战中分属北约成员与中立国两类阵营,却长期维持区域和平的现象。^② 布朗宁和马尔科·莱赫蒂(Marko Lehti)进一步将“北欧和平”视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品牌形象与政治资源,强调“北欧和平”不仅意味着北欧是一个“和平区域”(region of peace),而且也是一个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的“促和区域”(region for peace)。^③

安全共同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以物质权力与威慑均势为中心的安全观,论证持久和平可经由共有观念、集体身份与相互信任而生成。这一理论为解读北欧合作提供了有力工具,它解释了北欧国家为何能在缺乏统一防务安排且分属不同安全阵营的条件下长期维系“北欧和平”。这种“北欧和平”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区域内国家间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二是安全议题在彼此关系中实现“去安全化”;三是区域认同与相互信任替代了威慑逻辑。^④ 其后,文森特·普利奥(Vincent Pouliot)基于实践逻辑,将安全共同体定位于外交人员把和平解决争端视为不言而喻的方式,深化了对共同体微观运作机制的理解。^⑤

尽管北欧一直以来被视为论证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典型案例,但也有研究质疑该理论解释北欧地区合作的有效性。维夫认为,“北欧和平”的生成机理与安全共

^①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Ole Wæver, "Insecurity, Security and A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Community,"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9-118.

^③ Christopher S. Browning and Marko Lehti, eds., *The Nordic Peace in Question: A Region of and for Peace*, Routledge, 2016.

^④ Ole Wæver, "Insecurity, Security and A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Community," pp.69-118.

^⑤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2, No.2, 2008, pp.257-288.

共同体理论的预设并不一致。安全共同体理论假定共同体是为克服安全困境而被有意识构建的,但北欧和平是一种“非预期和平”(unintended peace),不是刻意设计的产物,而是长期互动演化、意外涌现的结果。^① 布朗宁和约恩涅米批判了区域和平的实现需要国家间不断消弭差异、建立高度相似的制度与认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北欧和平的实现并非用相似性替代差异性,而是对差异进行话语重构与重新接纳。^②

综上,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安全化理论和安全共同体理论分别从结构、话语、身份三个层面为理解北欧安全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这三个理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强调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可以较好地说明在外部压力下北欧各国间的安全相互依赖,即回答北欧各国的安全为何紧密关联的问题,但难以解释合作形态的差异问题;安全化理论强调话语实践的作用,可以较好地说明北欧国家如何建构合作议程,但难以解释合作的物质基础和长期演化;安全共同体理论突出共享身份的作用,可以较好地说明北欧合作为什么能够持续,但对身份形成与外部结构性因素的互动机制阐发不足。总体而言,这三个理论未能有效回答一个综合性问题,即在战后不同历史阶段,北欧安全秩序是如何被外部压力、共享身份、话语实践所共同塑造,并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与形态?鉴于此,本文尝试整合这三种理论资源,构建一个系统有机的分析框架。其目的不仅致力于深化对北欧安全合作的理论阐释,也尝试为次区域安全秩序研究提供一个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研究框架。

三 一个解释性分析框架:外部压力、共享身份与话语实践

本文构建一个由外部压力、共享身份、话语实践三要素组成的解释性分析框

^① Ole Wæver, "Insecurity, Security, and A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Community," p.90.

^② Christopher S. Browning and Pertti Joenniemi, "From Fratricide to Security Community: Re-theorising Differenc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Nordic Pea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16, No.4, 2013, pp.483-513.

架,以理解战后北欧安全秩序得以持续重构的内在逻辑。在该框架中,外部压力是塑造北欧安全合作具体形态的外生变量,共享身份是合作维系深化的内生变量,二者经由话语实践的建构和再生产,催生出北欧五国的对外政策,并最终塑造了北欧安全秩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涵与形态。

(一)外部压力

外部压力是指来自北欧地区之外、足以影响北欧国家安全感知和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约束。一般意义上,外部压力通常以如下形式呈现:一是安全压力,主要表现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如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对该地区造成的外溢压力、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给地区国家带来的威胁感知,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冲击,如恐怖主义、移民危机等;二是制度压力,主要是指冷战后初期欧洲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及其对北欧国家身份、制度、社会等领域的冲击;三是联盟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源自作为北约主导国美国的极限施压,表现在防务成本的分担,以及领土诉求等非典型联盟内部压力。

外部压力对北欧安全合作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发挥作用。其一,它能够改变北欧国家的威胁感知和身份认知。当北欧国家遭遇来自区域外的某一种共同威胁或冲击时,它们对自身认知调整的需要和进行安全合作的动力将会增强;其二,外部压力会重塑国际安全格局的结构和走势,使北欧国家在既有制度(北约、欧盟、北欧防务合作组织等)之间进行利弊权衡和战略选择;其三,重大外部事件(如俄乌冲突)会成为北欧国家进行战略反思和调整的“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进而推动既有合作模式的调整与转变。需要指出的是,外部压力本身并不直接决定合作模式和秩序形态,而是通过身份塑造和话语实践传导至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

(二)共享身份

共享身份是指北欧国家在长期历史互动中形成的、被相关国家政府和社会广泛接受的集体身份和价值体系。本文讨论的“共享身份”并非单一维度的概念,而是由多个相互关联但层次不同的身份认知构成。总体而言,北欧共享身份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规范身份,主要体现为北欧国家对民主政治、法治原则、社会平

等以及福利国家模式等共同价值的认同,^①这是北欧合作得以长期延续的价值基础;二是地区身份,主要表现为对“北欧”(Norden)或“北欧性”的认同,即北欧国家基于共同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地缘邻近性所形成的区域归属感,构成北欧合作的重要社会基础;三是安全身份,即北欧国家在特定安全环境下形成的共同安全认知和责任意识,包括冷战时期树立的“和平区域”形象、^②在国际调解和发展援助领域打造的“规范倡导者”声誉,^③以及近年来不断强化的“北欧团结”理念。

上述三个维度既相互联系,又具有不同的稳定性/动态性特征。其中,规范身份和地区身份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是北欧安全合作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而安全身份则具有更强的情境性和动态性,容易受到外部安全环境变化的影响。当区域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北欧国家往往会在既有规范身份和地区身份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其共同安全利益和责任边界,从而推动安全身份的强弱变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北欧国家逐渐形成从“北欧”到“北欧团结”(Nordic Solidarity)的共享身份认知转变,并进一步影响其安全合作模式和地区安全秩序的演化。

(三) 话语实践

话语实践是指北欧国家政府、学界、媒体及社会行为体通过言语、文本、仪式等方式进行的意义建构活动。通过借鉴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去安全化概念以及琳娜·汉森(Lene Hansen)的话语分析路径,^④本文将话语实践界定为“通过安全化与去安全化言说,将某些议题建构为安全威胁或解构其威胁性的话语行为”。具体而言,国家或国家群体在塑造地区身份与建构威胁认知时,一般会通过对共享身份中所蕴含的“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威胁来自哪里”等进行反复言说,并通过官方文件、首脑外交、联合声明等话语载体,实现对集体认同和共同威胁感知的塑造,以及对合作意图与合作议程的正式化表述。

① Mary Hilson, *The Nordic Model: Scandinavia Since 1945*, Reaktion Books, 2008, p.16; 郇庆治:《北欧政治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② Clive Archer, “The Nordic Area as a ‘Zone of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3, No. 4, 1996, pp.451-467.

③ Christine Ingebritsen, “Norm Entrepreneurs: Scandinavia’s Role in World Politics,” pp.11-23.

④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Routledge, 2006.

话语实践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具有特殊地位,它既是外部压力转化为对外政策的中介,也是共享身份得以维系和重塑的载体。具体而言,外部压力本身并不直接决定政策选择,而是经过话语实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意涵和政策选择。共享身份通过持续的话语实践(如外交修辞、联合宣言等)得以再生产。话语实践会反作用于外部压力的感知和共享身份的构成,形成循环建构甚至持续强化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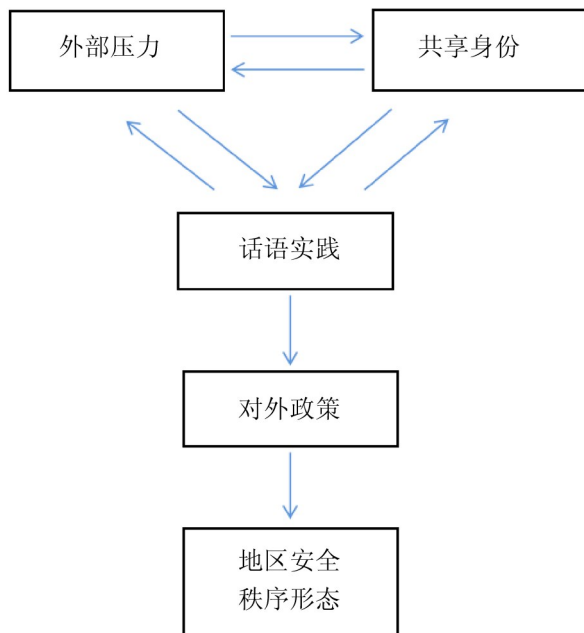
(四) 一个整体分析框架

本文对分析框架的建构主要遵循分析折中主义,即对不同研究传统中的理论进行补充、对话和选择性运用的一种智识立场。^① 具体而言,围绕二战后北欧安全秩序持续重构的研究问题,本文从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不同理论传统中选择有助于解释该问题的概念和工具,将其整合为一个更加系统全面的分析框架。其中,结构现实主义用于识别外部压力来源,建构主义用于分析共享身份如何塑造安全认知,后结构主义则用于解释安全话语如何赋予政策选择合法性。

如图1所示,外部压力、共享身份与话语实践三要素之间呈现为一个系统性的三组互动关系。其一,外部压力的性质和程度对共享身份的内涵与形态具有塑造作用,共享身份反映了行为体对外部压力的顺应或抵制;其二,外部压力为相关行为体决策者的话语实践提供素材和界定限度,话语实践通过解读、定义和回应的方式赋予外部压力以意义;其三,共享身份是相关行为体进行话语实践的意义来源和价值预设,而话语实践是共享身份的具体表述和再生产机制。在上述三组互动关系的综合作用下,对外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进而塑造不同时期安全秩序的内涵和形态。

^① Rudra Sil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econfiguring Problems and Mechanisms Across Research Tradi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8, Issue 2, 2010, pp.411-431.

图 1 北欧安全秩序的生成与演化机制



注：图由作者自制。

四 战后北欧安全秩序的历史演进

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关键节点进行划分,二战后北欧安全秩序的演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分别是冷战两极格局时期、冷战后欧洲一体化时期、后克里米亚危机时期,以及俄乌冲突与特朗普第二任期并行的时期。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外部压力、共享身份和话语实践共同塑造了不同内涵和形态的北欧安全秩序。

(一) 两极对抗格局下“北欧平衡”安全秩序的形成

冷战时期,北欧五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以美苏两大阵营的全球对抗和“恐怖平衡”为主要特征。作为军事能力有限的小国,它们身处对欧洲安全体系日益敏感的地缘战略区域,同时承受着来自美国和苏联的极限拉扯。一方面,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拉拢整合北欧国家,并不断敦促北欧盟国放松其自我克制。二战后初期,为通过区域合作实现联合武装中立,瑞典发起建立“斯堪

的纳维亚防务联盟”谈判,但该谈判因美国拒绝在北欧国家不加入北约的情况下向其提供武器援助而最终破裂。^① 1949年,丹麦、挪威、冰岛加入北约。1951年,美国和丹麦签署了《格陵兰防务协定》,使美国获得了格陵兰图勒(Thule)基地。另一方面,苏联对北欧施加较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尤其集中于芬兰。1948年4月,斯大林通过《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将芬兰锁定在苏联的安全外围,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就军事威胁相互磋商。1958年“夜霜危机”中,苏联通过外交与经贸施压导致法格霍尔姆政府垮台;1961年“照会危机”中,苏联则正式援引该条约提议举行军事磋商,最终以吉科宁总统解散议会、提前大选并连任而化解。^② 这表明芬兰外交政策受到苏联的实质性约束,形成了所谓“芬兰化”模式。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北欧国家陷入一种冷战时期小国面临的基本困境,即一旦接受大国援助,便可能丧失自主,因此寻求以自助抵御援助。^③

冷战两极对峙带来的安全焦虑,促使北欧五国逐步探索出一种具有内聚力的“北欧”身份,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安全维度,北欧被定义为比中欧紧张程度更低的地带;(2)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激烈竞争背景下,北欧提供了一条“第三道路”的福利模式;(3)北欧代表了一种(相较于老欧洲)更加开明、反军国主义的社会模式。^④ 由此可见,该时期北欧国家一方面通过刻意弱化安全身份以求在夹缝中自保;另一方面则通过强化规范身份和地区身份来突出其制度优越性,即北欧国家拥有不同于甚至优于其他一般国家的形象,并成为他者效仿的范本。^⑤ 这一共同身份为北欧五国在两极格局中寻求自主空间提供了心理支点。北欧国家通过北欧理事会(1952年)、北欧护照公约(1958年)和北欧部长理事会(1971年)等

^① Geir Lundestad, *America, Scandinav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49*,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Antti Ruokonen, “Why Finlandization Is a Terrible Model For Ukraine,” *Lawfare*, 21 April 2022, <https://www.lawfaremedia.org/article/why-finlandization-terrible-model-ukraine>.

^③ Nils Ørvik, “Defence Against Help: A Strategy for Small States?” *Survival*, Vol. 15, No. 5, 1973, pp.228-231.

^④ Ole Wæver, “Nordic Nostalgia: Norther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pp.77-102.

^⑤ Christopher S. Browning, “Branding Nordicity: Models, Identity and the Decline of Exceptionalism,” pp.27-51.

机制,在文化、社会、经济、人员流动等领域维持了较高的互动水平,持续深化了彼此对“北欧”身份的认同。

在外部压力和共享身份的共同影响下,北欧国家在这一时期以“去安全化”话语范式逐渐塑造了以“北欧平衡”为核心特征的地区安全秩序。“北欧平衡”描绘了北欧五国通过差异化安全安排共同维系地区稳定的秩序形态,这种差异化安排表现为挪威、丹麦、冰岛作为北约创始会员国将国防与美国进行绑定,芬兰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瑞典则坚持“平时不结盟、战时中立”的非同盟立场。^①其中,北欧国家关于建立“北欧无核区”的相关倡议和对外政策,较好地展现了这些国家是如何建构和践行“北欧平衡”的。

1961年,瑞典外交大臣厄斯滕·翁登(Östen Undén)提出“非核俱乐部”(non-nuclear club)倡议,被视为“无核区”话语体系和现代防扩散机制形成的重要起点。1963年,时任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Urho Kekkonen)发表演说提出“北欧无核区”倡议,史称“吉科宁计划”。他试图通过建立北欧无核区将该地区事实上无核的现状正式确立下来,从而使北欧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超级大国的战略部署。^②瑞典在建立北欧无核区过程中表现尤为积极。1978年,瑞典试图扩大拟议的无核区范围,将波罗的海纳入其中。1983年,瑞典甚至提议将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边界两侧150公里范围纳入该区域。^③通过无核政策践行“北欧平衡”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丹麦与挪威的自我克制,这两个北约成员国通过拒绝在其领土上接受外国基地和核武器的方式,来承认并容纳苏联的安全利益。这种单边克制向苏联传递了一个安抚性的关键信号,即北欧不会成为西方主要大国的前沿基地。^④尽管北欧五国在构建无核区问题上并未制定统一政策,但他们在单独表达和各自行动

① Arne Olav Brundtland, “The Nordic Balance: Past and Present,” pp.30–63.

② Eric Solsten and Sandra W. Meditz, eds., *Finland: A Country Study* (Second Edition),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0.

③ Naman Karl-Thomas Hattom, “The Rise and Fall of Sweden’s Nuclear Disarmament Advocac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December 29, 2024, <https://thebulletin.org/2024/12/the-rise-and-fall-of-swedens-nuclear-disarmament-advocacy/>.

④ Johan Jørgen Holst, “Five Roads to Nordic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7, No.1, 1972, pp.133–137.

中,形成了一种在相互监督和相互预期下的克制秩序,在紧张的冷战时期共同维持北欧地区的低张力均衡。

(二) 欧洲化冲击下以“北欧性”为底色的安全秩序维系

冷战的结束极大改变了北欧地区的外部安全环境。苏联的解体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北欧地区所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然而“欧洲化”进程的兴起和推进却构成北欧国家面临的新型外部压力。根据既有相关研究,“欧洲化”具有五重含义:一是欧洲向全球其他地区输出文化规范的过程;二是欧洲朝着政治联合、实力增强方向发展的态势;三是欧盟层面专属治理体系的逐步构建;四是欧洲集体认同的形成与发展;五是各成员国受欧盟层面影响,对本国政治架构作出调整,涵盖制度体系、公共行政、法律框架,以及价值规范体系等诸多方面。^① 相较于冷战的结束,这种“欧洲化”态势给北欧国家造成的冲击似乎更大,正如佩妮莱·里克(Pernille Rieker)强调的,“北欧国家并未直接回应冷战结束所造成的新条件,而是因欧洲一体化进程改变了安全路径”。^② 首先,北欧面临最重要的挑战不再是维持其“例外主义”身份,而是如何将自身融入新的欧洲安全语境。其次,相较于其他多边框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蕴含的高水平政治整合,使北欧民族国家的安全身份更易受到欧盟这类新兴共同体的影响。最后,“欧洲化”对北欧国家的冲击程度不一。对瑞典和芬兰而言,欧盟成员国身份对其长期奉行的传统中立政策施加了较大压力;对丹麦而言,北约成员身份与欧盟安全路径之间的张力,使其从一个北约的“脚注”(footnote)国家^③转变为欧盟的“脚注”国家;对挪威而言,冷战结束严重挑战了其在北约中的特殊位置,使其不得不通过密切关联欧盟以适应“欧洲化”的冲击。

在新的外部环境下,冷战时期形成的北欧身份陷入危机,^④“北欧”作为一个独

^① Pernille Rieker, *Europeaniz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 The EU and the Changing Security Identities of the Nordic States*, Routledge, 2006, p.12.

^② Ibid., p.xiii.

^③ Nikolaj Petersen, “‘Footnoting’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Denmark’s NATO Policy in the 1980s,” in Linda Risso, ed., *NATO at 70: A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 Routledge, 2019.

^④ Ole Wæver, “Nordic Nostalgia: Norther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pp.77-102.

立的“地区品牌”面临被消解的风险。^① 在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北欧国家围绕“欧洲性”与“北欧性”进行了一番权衡和博弈,他们在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上均不同程度地分化出“赞成”和“反对”两派意见。^② 丹麦早于20世纪70年代便加入了欧洲共同体,但始终没有因此而放弃北欧身份,相反它致力于在国家身份与欧洲身份之间发挥桥梁(bridge-builder)作用。^③ 瑞典是北欧国家中最不情愿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国家,但其国内赞成派和反对派均将经济增长视为核心目标,这为推动瑞典“福利国家”身份和欧洲身份之间的相向而行提供了重要动力。^④ 尽管挪威将其民族身份(Norwegians are a people)界定为欧洲民族(European people)的天然组成部分,但从利益视角出发,挪威将欧盟视为其国家身份的威胁,并最终拒绝加入欧盟。^⑤ 芬兰是北欧地区中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接纳度最高的国家。与挪威不同,芬兰没有将欧盟视为对国家身份的威胁,反而将成为欧洲人界定为其国家利益,并强调“芬兰性”与“欧洲性”之间的互补关系。^⑥ 总体而言,尽管该时期北欧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欧洲化要素,但基本上维系了他们之间所共享的北欧规范身份和地区身份,并在欧洲防务财政紧缩的倒逼下强化了对安全身份的重视,集中表现为以“巧防务”(smart defence)为核心特征的制度化合作。

2007年,北约成员国挪威和军事不结盟的瑞典提交了一份由两国国防参谋长

① Christopher S. Browning, “Branding Nordicity: Models, Identity and the Decline of Exceptionalism,” pp.27-51.

② Lene Hansen and Ole Wæv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allenge of the Nordic States*, Routledge, 2002.

③ Lene Hansen, “Sustaining Sovereignty: The Danish Approach to Europe,” in Lene Hansen and Ole Wæv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allenge of the Nordic States*, Routledge, 2002, pp.50-87.

④ Lars Trägårdh, “Sweden and the EU: Welfare State Nationalism and the Spectre of ‘Europe’,” in Lene Hansen and Ole Wæv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allenge of the Nordic States*, Routledge, 2002, pp.130-181.

⑤ Iver B. Neumann, “This Little Piggy Stayed at Home: Why Norway Is not a Member of the EU,” in Lene Hansen and Ole Wæv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allenge of the Nordic States*, Routledge, 2002, pp.88-129.

⑥ Pertti Joenniemi, “Finland in the New Europe: A Herderian or Hegelian Project?” in Lene Hansen and Ole Wæv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Challenge of the Nordic States*, Routledge, 2002, pp.182-213.

委托起草的联合研究报告,内容涉及加强挪威防务合作的可行性。次年,鉴于国防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芬兰加入挪威倡议,并共同提出了北欧支持性防务结构(NORDSUP),该结构是对北欧军事和平支持协调安排(NORDCAPS)和北欧军备合作(NORDAC)的补充。在上述合作基础上,2009年,挪威资深政治家托瓦尔德·斯托尔滕贝格发表报告(Stoltenberg Report),提出了13条加强北欧外交和防务合作的具体建议,包括加强北欧防务装备合作、共享情报和监视等。^①同年,涵盖北欧五国的北欧防务合作组织(NORDEFCO)正式成立,旨在通过多国合作,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升国家军事能力。这种合作加速制度化的背后,是北欧政治家和人民对北欧合作持有的积极态度,^②并得到了北约主导国美国的明确支持。^③

(三) 克里米亚危机与“北欧团结”驱动下的安全秩序重塑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使北欧国家在冷战后重新感受到来自俄罗斯方面强大的外部压力,成为推动北欧地区安全秩序发生根本性转折的重要动力。危机爆发前,俄罗斯虽被北欧五国视为重要邻国但并非紧迫的安全威胁。然而,危机的爆发以及其后北欧国家与俄罗斯的一系列互动行为,促使北欧国家的外部压力陡然上升。2014年10月中旬,瑞典军方在斯德哥尔摩群岛海域截获了疑似源自俄罗斯海军紧急频率的无线电信号。对此,瑞典国防军出动舰艇、扫雷艇、直升机及超过200名地面部队,对该海域进行了长达一周的全面搜查。2015年,北约计划在丹麦部署反导体系,作为危机以来对俄罗斯加强战略威慑的一个重要步骤。俄罗斯方面则表示,若丹麦加入北约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丹麦军舰将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目标。在这些互动影响下,北欧国家对俄罗斯的认知从“困难的伙伴”(difficult

^① Thorvald Stoltenberg, “Nordic Cooperation 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roposals Presented to the Extraordinary Meeting of Nordic Foreign Ministers in Oslo on 9 February 2009,” Oslo, 2009.

^② Håkon Lunde Saxi, “The Rise, Fall, and Resurgence of Nordic Defence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5, No.3, 2019, pp.659–680.

^③ Anne-Sofie Dahl, *NORDEFCO and NATO: “Smart Defence” in the North?* NATO Defense College, 2014.

partner) 开始转变为“主要安全挑战”(main security challenge)。^① 正如芬兰国防部长在 2015 年明确表示,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如乌克兰危机),意味着芬兰应重新考虑其防务政策。^②

危机带来的外部压力促使北欧共享身份中的安全身份维度发生了较大调整,具体呈现为两个层面:一是重新激活了俄罗斯安全威胁的共同意识。北欧国家长期奉行的“中立”立场面临挑战,这一立场建立在自我认知相对安全的前提上,而克里米亚危机使这一前提遭到严重动摇。作为“北欧平衡”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和践行者,瑞典在 2015 年发表的《国防政策方向——2016—2020 年瑞典的国防》中明确将俄罗斯的行为认定为欧洲安全形势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③ 二是强化了北欧团结的共同意识。危机促使瑞典议会 2009 年通过的单边团结声明^④以及北欧五国 2011 年达成的北欧团结声明^⑤重获合法性。五国意识到,单独应对俄罗斯威胁能力有限,必须通过深化合作来增强集体安全。因此,它们于 2018 年发表《北欧防务合作愿景 2025》明确指出,尽管北欧国家拥有不同的安全政策归属,却面临相同的挑战,因此必须力求紧密、有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合作。^⑥

在安全身份强化的推动下,北欧国家在话语和政策实践上开启“再安全化”进程。瑞典是这一进程中表现最为抢眼的国家。自危机爆发以来,瑞典开始践行“胡尔特奎斯特主义”(Hultqvist doctrine),即在保持军事不结盟的同时,深化与北

① Håkon Lunde Saxi, “The Rise, Fall, and Resurgence of Nordic Defence Cooperation,” pp.659–680.

② “Minister Niinistö: Finland Needs to Rethink Its Defence of Åland,” Yle, 30 July 2015, <https://yle.fi/a/3-8193007>.

③ “Sweden’s Defence Policy 2016 to 2020,” Swedish Ministry of Defence, 1 June 2015, https://government.se/globalassets/government/dokument/forsvarsdepartementet/sweden_defence_policy_2016_to_2020.

④ 单边团结声明(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Solidarity)称,瑞典不会在另一欧盟或北欧国家遭遇灾难或攻击时袖手旁观,并期待对方在瑞典受影响时采取相应行动,瑞典应有能力既给予也接受军事支援。

⑤ 北欧团结声明(Nordic Solidarity Declaration)申明,若任何北欧国家遭受灾难、网络攻击或恐怖袭击,其他国家将在现有欧盟和北约框架之外提供相互援助。

⑥ “Nordic Defence Cooperation Vision 2025,” 13 November 2018, <https://www.fmn.dk/globalassets/fmn/dokumenter/nyheder/2018/-13-11-2018-nordefco-vision-2025-.pdf>.

约、美国、芬兰等国的合作。^① 2015年4月,挪威、芬兰、瑞典和丹麦等国的国防部长和冰岛外交部长发表了一篇联合专栏文章,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描述为导致北欧地区安全局势明显恶化的原因。他们坚持认为,北欧国家正面临一个新常态,并且需要通过加强北欧防务合作来应对这一局势变化。^②

在这一“再安全化”进程推动下,一度角色模糊的北欧防务合作组织迎来了复兴的机遇,其目标被重新定义为应对俄罗斯的安全挑战。在这一框架下,北欧五国的双多边安全合作迎来了一波新发展。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瑞典和芬兰两个不属于任何军事联盟的国家之间加强了双边防务关系。2018年,两国签署了一份关于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允许双边军事合作涵盖所有情况下的作战规划。^③ 瑞典和芬兰应对俄罗斯威胁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拉近与北约的关系。两国先于2014年北约威尔士峰会上加入“增强机会伙伴关系”,并在其后两年批准了与北约的“东道国支持协议”。^④ 危机前对北欧多边安全合作持相对犹疑态度的丹麦,也在该阶段加强其在区域内集体防御的参与度。2016年,丹麦与瑞典签署了一项协议,为彼此提供更好的进入对方领空和领海的机会,并允许改善空中和海上监视数据的交换。^⑤ 丹麦在2016年担任北欧防务合作组织主席国期间,将重点工作放在达成一项泛北欧的“便捷准入协议”上,该协议规定和平时期北欧国家向彼此武装部队开放领土。^⑥

① Anna Wieslander, “The Hultqvist Doctrine—Swedish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After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Crimea,” *Defence Studies*, Vol.22, No.1, 2022, pp.35–59.

② “Russland-aggresjonen: Norden girer opp militært samarbeid,” *Aftenposten*, 9 April 2015, <https://www.aftenposten.no/verden/i/Egr5/russland-aggresjonen-norden-girer-opp-militaert-samarbeid>.

③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Fin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Sweden on Defence Cooperation,” 9 July 2018, <https://www.regeringen.se/globalassets/government/dokument/forsvarsdepartementet/2018/mou-finnish-swedish-defence-cooperation-20180625.pdf>.

④ Anna Wieslander, “What Makes an Ally? Sweden and Finland as NATO’s Closest Partners,” *Journal of Transatlantic Studies*, Vol.17, 2019, pp.194–222.

⑤ “Sweden and Denmark Reach Bilateral Defense Agreement,” *Defense News*, 22 January 2016,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europe/2016/01/21/sweden-and-denmark-reach-bilateral-defense-agreement/>.

⑥ NORDEFCO, “Annual Report 2016,” Danish Ministry of Defence, 2017.

除达成上述协议外,北欧国家还举行了一系列有北约参与的旨在提高互操作性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瑞典和挪威分别于 2017 年和 2018 年主办了规模庞大的“极光 17”(Aurora 17)和“三叉戟接点”(Trident Juncture)演习,来自北欧和北约国家的大量部队,真实演练了如何共同保卫北欧—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要地。其中,超过 13000 名北欧部队参加了“三叉戟接点”演习,包括一个瑞典旅,该旅下辖一个芬兰陆军分遣队;丹麦为挪威旅提供直升机支援,而冰岛则作为跨北大西洋部署和支援盟军力量的战略集结区。^①截至 2019 年,北欧防务合作模式较前一阶段发生较大变化,特别是焦点的转移,逐渐从国防经济学驱动的武装力量协调,转向由安全政策关切驱动、旨在应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军事作战合作。

(四) 俄美双重压力下次区域一体化安全秩序的深化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北欧国家开始同时承受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外部压力。在东边,俄罗斯于 2022 年 2 月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深刻重塑了欧洲安全秩序,北欧国家首当其冲。芬兰与俄罗斯拥有约 1300 公里共同边境,瑞典哥特兰岛扼守波罗的海核心航道,距离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仅 300 余公里,两国直接暴露在俄军事力量辐射范围内。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与边境区域的战机巡航、海军活动频次显著提升,芬兰官方明确将俄罗斯定性为“欧洲最严重的安全威胁”^②,瑞典国防委员会也公开表示“无法排除本土遭武装袭击的可能性”^③。在西边,2025 年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欧洲采取多维度极限施压手段。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 2025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责欧洲国家

① Frank Bakke-Jensen, “Norway’s Defense Minister: Ensuring Collective Defense and Deterrence in the Northernmost Corner of Europe,” *Defense News*, 10 December 2018, <https://www.defensenews.com/outlook/2018/12/10/norways-defense-minister-ensuring-collective-defense-and-deterrence-in-the-northernmost-corner-of-europe/>.

② “Government Report Discusses Changes in Finland’s Security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Finland, 13 April 2022, https://um.fi/current-affairs/-/asset_publisher/gc654PySnjTX/content/valtioneuvoston-ajankohtaislonteossa-kasitellaan-suomen-turvallisuussympariston-muutosta.

③ “The Swedish Defence Commission’s Report on Security Policy, The Defence Commission’s Secretariat,” 19 June 2023, <https://www.government.se/globalassets/government/dokument/forsvarsdepartementet/forsvarsberedningen/excerpts-of-the-swedish-defence-comissions-report-on-security-policy-june-2023.pdf>.

偏离了“共同价值观”,主张欧洲的主要危险来自其内部对民主规范的侵蚀,而非俄罗斯或中国的威胁。^① 在贸易领域,特朗普称欧盟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并对欧盟先后征收“对等关税”、进口汽车关税、钢铝关税等。在领土完整问题上,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国“必须拥有”格陵兰岛,并不排除使用经济胁迫和军事手段,使北欧地区面临来自传统盟友的不寻常压力。^② 这种双重压力迫使北欧国家在面临俄罗斯威胁的同时,还需考量如何在不可预测的盟友关系中维护自身利益。

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北欧共享身份正发生深刻调整。其一,北欧国家的安全身份较前一阶段进一步得到较大幅度的强化,并彻底放弃了维系“北欧平衡”的共同认知。在北欧国家看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印证了2014年以来其对“修正主义俄罗斯”的叙事,瓦解了瑞典和芬兰长期坚持的“军事不结盟”信念。2022年5月,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与总理桑娜·马林(Sanna Marin)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加入北约将增强芬兰的安全,芬兰应当毫不拖延地申请加入北约。^③ 同月,瑞典首相马格达莱娜·安德松(Magdalena Andersson)宣布瑞典正式决定申请加入北约,结束该国逾两百年的军事不结盟传统。^④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国在战前均宣称加入北约“极不可能”且不结盟有利于北欧的稳定。其二,以地区身份为依托的“北欧团结”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对美国可靠性的质疑促使北欧国家从单纯依赖跨大西洋纽带,转向更加注重欧洲战略自主和北欧集体防务的复合战略。丹麦在格陵兰问题上得到了北欧伙伴前所未有的政治支持,强化了北欧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认同。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Ulf

① Tobias Bunde and Sophie Eisentraut, “Westlessness Reloaded? Key Takeaways from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5,”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unich Security Debrief 1, February 2025.

② Mikkel Runge Olesen and Jon Rahbek-Clemmensen, eds., *Greenland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ew Players, New Strategies*,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5.

③ “Joint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and Prime Minister of Finland on Finland’s NATO Membership,”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Finland, 12 May 2022, <https://www.presidentti.fi/niinisto/en/press-release/joint-statement-by-the-president-of-the-republic-and-prime-minister-of-finland-on-finlands-nato-membership/index.html>.

④ “Sweden Announces NATO Bid, Ending Its Historic Neutrality,” 16 May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5/16/sweden-announces-nato-membership-bid-one-day-after-finland>.

Kristersson) 在 2026 年年初表示:“我们对美国目前在委内瑞拉所做和正在做的事情持高度批评态度,并可能对针对格陵兰和丹麦的言论持更加批评的态度。”^①

在这一时期,北欧国家安全合作在共享身份引领下不断深化,并逐渐由对北约的补充向更具战略自主性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展现出较高韧性的外交自主性。尽管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大幅削弱了对乌克兰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北欧国家仍坚定致力于支持和保卫乌克兰,并将之视为欧洲的集体责任。丹麦强调愿将更高比例的 GDP 用于国防开支,认为这是对欧洲和丹麦安全与防务的必要贡献;冰岛、挪威和瑞典也秉持同样的团结精神,后两国对美国持更为批判的态度;芬兰则强调欧洲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合作的必要性。^②二是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展现出高度凝聚力。针对特朗普的“夺岛宣言”,北欧五国于 2026 年 1 月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共同致力于维护北极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并重申涉及丹麦和格陵兰的事务应由丹麦和格陵兰单独决定。^③同年 3 月,针对北极地区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五国与加拿大一致认为,基于国际法、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国际合作,仍是加强共同安全与繁荣的最佳途径。作为民主国家和致力于法治、人权以及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国家,它们共享基本价值观和优势。^④三是次区域安全一体化的日益深化。随着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北欧各国开始在空军合作领域加速打造所谓“迷你北约”。2025 年 3 月,涵盖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四国空军的北欧师(Nordic Division)在挪威联合空中作战

① “Sweden ‘Highly Critical’ of US Rhetoric on Greenland and Denmark, Says PM,” Reuters, 11 January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sweden-highly-critical-us-rhetoric-greenland-denmark-says-pm-2026-01-11/>.

② Niklas Klein Nielsen and Anders Wivel, “Scandinavian Reactions to the Second Trump Presidency: A Way Forward for Small State Agenc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ecurity Hub, 17 September 2025, <https://securityhub.ee/blog/scandinavian-reactions-to-the-second-trump-presidency-a-way-forward-for-small-state-agency/>.

③ “Joint Statement by the Nordic Foreign Ministers on Greenland,”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6 January 2026, <https://www.government.se/statements/2026/01/joint-statement-by-the-nordic-foreign-ministers-on-greenland/>.

④ “Joint 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s of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Canada,”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15 March 2026, <https://www.pm.gc.ca/en/news/statements/2026/03/15/joint-statement-prime-ministers-nordic-countries-and-canada>.

中心成立。该部门的任务旨在打造一支北欧一体化的空中力量,在全面联合空中作战中具备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一举措被视为北欧空中领域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①

表 1 战后北欧安全秩序的内涵与形态

逻辑要素 历史阶段	外部压力	共享身份	话语实践	地区安全秩序
1948—1991 年	美苏两大阵营全球性对抗	“北欧”(Norden)	去安全化范式	两大阵营间的“北欧平衡”,超然于世的“北欧和平”
1991—2014 年	欧洲一体化冲击	北欧性(Nordicness)	去安全化范式	以“巧防务”为代表的、初步制度化的次区域安全合作
2014—2022 年	克里米亚危机	“北欧团结”(Nordic Solidarity)的复兴	再安全化范式	北欧内部多双边合作加速发展,“北欧—北约”安全关系强化
2022 年至今	俄乌冲突,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	“北欧团结”的深化	再安全化范式	“北欧平衡”终结,次区域安全一体化深化趋势加强

注:表由作者自制。

五 结语

本文通过整合地区安全复合体、安全化与安全共同体等理论资源,建构了一个基于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框架,对战后 80 年北欧安全秩序的持续重构逻辑进行了系统考察。既有研究或倾向于将安全合作视为对威胁分布变化的功能性回

^① “Four Nordic Air Forces Fighting as One,” Nordic Air Forces, 3 March 2025, <https://www.forsvaret.no/en/news/articles/nordic-division>.

应,或关注共享身份对合作的维系作用,或强调话语实践对政策的建构功能。而北欧案例表明,次区域安全秩序的演化并非外部威胁变化的直接结果,而是一个由结构压力、共享身份与话语实践共同作用的社会建构过程。其中,外部压力能够触发秩序调整的需求,但并不会自动决定合作的方向,共享身份为行为体理解外部环境提供意义框架,而话语实践则进一步将这种身份认知转化为更加具象化的政策选择。

此项研究在解释既往北欧安全合作的同时,也为未来北欧安全秩序的演进方向提供了一定参考。在大国博弈加速演化和地缘政治冲突延宕外溢的时代,北欧国家将承受更多来自多方面的外部压力,其以内部团结求生存安全的意识也将不断强化,并采取更加具有内顾性的外交安全政策,北欧安全秩序或因之朝向持续内聚化的方向发展。此外,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推动以往“北欧平衡”下相对分化的地区安全地理结构转向更具一体化的属性,这也有助于域内国家在安全理念、合作诉求和互操作性等层面持续推动北欧安全秩序的内聚化发展态势。

在这种趋势下,主要域外行为体在北欧地区(特别是北极地区)的战略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受北欧国家内顾性安全政策影响最大的是俄罗斯与美国。从 2026 年年初北欧国家接连发布的相关联合声明来看,它们共同致力于在大国博弈中提升战略自主权,一方面将对冲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压力,压缩俄罗斯构筑“北极堡垒”的地缘战略空间;另一方面,北欧国家将继续防范和抵制美国单边霸权主义对地区国家主权的破坏,通过划定红线等方式迫使美国改为采取相对温和的地区政策。相较而言,“北欧团结”的持续强化为欧盟深度参与高北地区事务提供了重要机遇和战略抓手。欧盟主要国家顺势而为,法国、德国等均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如积极参与由丹麦牵头的“北极耐力”演习,以此展现共同应对地区紧张局势的态度。^①最后,北欧国家加强战略自主将为中国与地区国家提供更大的合作空间。在同时面临美国和俄罗斯双向压力的背景下,北欧国家对加强与中国战略合作的需求显著提升。例如,应北欧四国外长邀请,中国外交部长

^① “Arctic Endurance Demonstrates Europe’s Resolve and Caution,” EU Perspective, 16 January 2026, <https://euperspectives.eu/2026/01/arctic-endurance-demonstrates-europes-resolve/>.

王毅在 2026 年 7 月对北欧进行访问。这次访问不仅能够推动中国与北欧在多领域合作的深化,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欧盟关系持续稳健发展。^①

尽管上述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仍存在如下局限。其一,外部压力、共享身份、话语实践三要素之间存在内在的相互建构关系,在经验分析中难以实现要素的完全区分与因果识别,框架的解释力更多体现为机制阐释而非严格的因果检验;其二,本文主要依托政府文本、精英话语与二手文献,对社会受众、媒体及次国家行为体的话语互动着墨有限,可能简化了安全化过程中的多元受众结构。

在本文初步构建的研究框架基础上,未来研究可在三个方向上进一步拓展。一是该框架具备应用于其他次区域安全合作和安全秩序的潜力,可通过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提升其普遍解释力;二是引入过程追踪等方法,对关键时刻中话语实践如何改变具体政策选择展开更精细的微观考察;三是进一步关注北欧安全一体化与北约、欧盟等更高层级安全架构之间的互动张力,以及域外大国介入对北欧共享身份再塑的影响,从而在小国能动性与大国结构性博弈的交汇处深化对次区域安全秩序的理论认识。

(作者简介:彭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高层次人才特聘教授—珠江学者。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中欧关系承压之际王毅出访北欧四国,专家:一场“求同存异”之行》,澎湃新闻,2026 年 7 月 2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495740.